

# 蘇聯介入維吾爾民族主義

## ——評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

● 侍建宇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王柯現為日本神戶大學教授，近年著作多關注現代中國國家格局形成的相關議題。本文所評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

1940年代》（以下簡稱《東突運動》，引用只註頁碼），是由他的日文版東京大學博士論文翻譯成漢語<sup>①</sup>，並添加第一章「在『烏瑪』與『中華』之間——清王朝對新疆維吾爾族社會的統治」<sup>②</sup>，以及補充晚近一些中國大陸二手研究材料，改寫而成。

這本研究1930至1940年代「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專著大致可以切割成三部分，即帝國格局轉型的困境、國際強權介入新疆民族政治，以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治。全書分為十章，第一與第二章的內容描述大清帝國治理新疆的框架，也推展出1944年「伊寧起義」<sup>③</sup>的遠因：大清帝國的民族認同分歧無法見容於現代民族國家格局，在帝國格局無法成功轉型之際，自然就會催生民族分離運動。第三與第四章鋪陳1930至1940年代俄、日國際強權介入新疆政治，使得民族認同被操弄，並作為強權豪奪利益的工具。第五到第九章則檢討「伊

王柯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大致可以切割成三部分：帝國格局轉型的困境、國際強權介入新疆民族政治，以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治。

針對二十世紀初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在漢語學界的撰述多為官方論述所主導，並且由於相關檔案材料取得不易，王柯這本專著能以漢語出版，顯得難能可貴。

寧起義」與建立東突國的過程、內部不同勢力的競合。這部分的論述包括更細膩的族裔與政治認同關係的塑造，以及蘇聯的操弄方式。第十章作為全書的結論，旨在批評第二次東突國獨立運動在國際現實政治干擾下，民族革命性質變調，也使得原有社會改革的目的落空。

王柯討論東突獨立運動的日文版博士論文最初於1995年出版，深受日本學界推崇，但也引起一些爭議，多糾結在如何理解現代民族意識與中國史觀。抱持較開放態度的學者多予以鼓勵，讚賞這本著作能夠運用難以獲得的史料，討論鮮為人知的東突獨立運動，並評選推薦此著獲得日本「三得利學藝賞」④。但是也有學者以為此著過於強調蘇聯介入東突獨立運動的重要性，卻沒有運用蘇聯政府的檔案史料進行佐證，並不妥當⑤。也有人甚至輔以後來王柯一系列關於現代中國民族與國家的研究著作⑥，批評他在撰述時似乎有意忽略維吾爾民族主義意識的自主勃興，深層的意識可能在於為中國官方的「多民族國家觀」進行辯護。換言之，他們批評王柯並未從新疆當地族裔的角度思考、理解這些族裔身份意識混淆的苦楚以及無所適從的國家認同⑦。

筆者認為，針對二十世紀初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在漢語學界的撰述多為官方論述所主導，並且由於相關檔案材料取得不易，王柯這本專著能以漢語出版，當然顯得難能可貴。

## 一 新疆民族問題的歷史縱深

《東突運動》的第一章介紹大清帝國的治理格局。作者認為新疆作為大清帝國的一個「藩部」、一種「盟友」用以牽制中原地區龐大的漢族子民。當時新疆設立「伊犁將軍」的軍府制度，將帝國的漢、回社會進行隔離，一方面，軍隊統帥權設計為「旗缺」，抓在八旗人手上；另一方面，在民政上則因地制宜，特別在維吾爾族聚居的南疆綠洲設置「改良型伯克制」⑧。清廷把地方上大眾日常相關事務的管理權力交給當地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進行管理。「伯克」負責行政，但是職務不能世襲，同時剝奪和卓與阿訇等宗教人士擔任「伯克」的權利，以實行「政教分離」（頁4-14）。

這樣對歷史的闡述其實傳承日本的東洋史傳統⑨，與近年美國學界所提出的「新清史」也有着類似之處⑩。這種論述認為清代滿族對中原四周邊疆的管控，並不能與前朝相提並論，不能倒古為今地一概以「以夷制夷」或「改土歸流」等概念硬套，因為這是滿清帝國特有的政治格局，故主張應該去除「漢族中心」的史觀。

清朝的「伯克」制度有效籠絡南疆地方的上層階級，固然有利於地方政務推動，但也容易導致吏治敗壞，引起統治危機。王柯在書中也論述清代新疆的政治制度並不能杜絕「伯克」與中央派任的地方官員勾結。由清廷中央直接派任的辦事大臣、領隊大臣有權監督，甚至

直接參與民政事務推動，也兼管「伯克」升遷黜陟，所以常有與當地「伯克」相互勾結、賄賂庇縱的情況。因此，不時有不同新疆地方政治勢力藉機發動宗教聖戰，訴求終結「異教徒」統治，而來自浩罕的「阿古柏之亂」(1865-1877)就是最好的例證。

在第二章「『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起源——運動產生的社會背景與發生形態」中，王柯指出「東突厥斯坦」不是一個清楚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政治理念，源頭則是土耳其與喀山流入的泛突厥主義，並在二十世紀初透過新疆的新式學校教育而四處傳播。這在第一次東突獨立運動時呈現三個特徵：訴求「反漢」情緒、推動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再加上透過伊斯蘭宗教，黏着不同社會階級背景，呼籲建立烏瑪宗教國，以進行政治動員(頁27-36)。

王柯似乎企圖說明，即便清廷在十九世紀末透過新疆建省，並實施政治改制，也無法快速扭轉當地的社會結構與相應的民族認同，情況反而持續惡化。當時新疆省與縣級的官職把持在漢人手裏，縣以下的鄉、村則由維吾爾人負責，而任務主要是管理低階的行政、水利、訴訟。類似地方鄉紳與地主的「阿克薩卡爾」(ak-saqal)則直接面對人民，輔治理(頁40-45)。這樣的制度隨着吏治腐敗與財政惡化，累積不少民怨。曾經與國外接觸過的新興知識份子與宗教人士一旦開始動員，就迅速引爆民族主義訴求。

《東突運動》第一與第二章所呈現的歷史縱深，透過描繪大清帝

國的治理格局、維吾爾民族主義藉「東突認同」而興起出現，再輔以新疆當地穆斯林的「烏瑪」想像，以及新疆建省改制卻無法安頓並重塑國族認同的背景，使人期待作者會進一步討論帝國治理框架轉型的困境，在該書後面的章節繼續討論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如何遭遇、衝撞維吾爾民族主義所主導的東突獨立運動。但是王柯對中國現代民族主義並沒有多所着墨，只在書中〈前言〉與〈後記〉點到為止地暗示，近年在新疆發生騷亂的源頭都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東突獨立運動，而背後支撐的意識形態就是「雙泛」(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頁xi-xii、326-27)。這樣的說法其實太過寬泛，並沒有深究中國民族主義遞嬗，以及如何影響其他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認同塑造。此外，這種講法似乎也太過以古喻今，有失嚴謹。如果1884年新疆建省到1933年第一次東突獨立運動爆發這段時間因為各種原因而導致重塑國族認同失敗，那麼從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到現在，新疆民族問題又為何仍然紛紛擾擾？筆者認為這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雙泛」認同而帶過，其中在理論與實務上，必然牽涉到中共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否能夠有效處理族裔衝突，以及其他相關的繁複議題。

## 二 蘇聯與其他國際勢力 介入東突獨立運動

如果把中原王朝作為中國主體，二十世紀初執政者意欲將大清

王柯暗示近年在新疆發生騷亂的源頭都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東突獨立運動，而背後支撐的意識形態就是「雙泛」。這樣的說法太過寬泛，並沒有深究中國民族主義遞嬗，以及如何影響其他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認同塑造。

王柯討論蘇聯參與「伊寧起義」的口徑與澳洲學者王大剛類似，強調蘇聯直接介入事件，但是也另外切入三個新議題：日本對新疆的企圖、蘇聯與盛世才的關係，以及伊犁政權內部菁英的權力爭奪。

帝國的版圖生硬地嵌入現代民族國家結構，那麼在轉型的過程中，一定會遭遇各個次級族群與政治認同不一致的困境。就算時至今日，也很難論斷這個過程已經結束。至於從十九世紀下半葉的阿古柏之亂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東突建國運動，新疆是否能脫離中國而獨立，也的確需要考量當時弱肉強食的國際勢力範圍之爭——國際政治於是成為「伊寧起義」的另一條論述途徑。

王柯討論蘇聯參與「伊寧起義」的口徑其實與澳洲學者王大剛的一本專著類似<sup>①</sup>，強調蘇聯直接介入事件，但是也另外切入三個新議題：日本對新疆的企圖、蘇聯與盛世才的關係，以及伊犁政權內部菁英的權力爭奪。

王柯在第三章「反日親蘇路線的表與裏——盛世才的政治路線與新疆民族問題」中，回顧日本對新疆曾經有過的企圖。他評估昭和對日本對新疆沒有直接的領土野心，只是擔心蘇聯一旦控制新疆，可能威脅日本在滿、蒙地區的「特殊利益與地位」。也可能基於這樣的考慮，在中日戰爭頻臨爆發時，日本軍部開始有人計劃把新疆納入「勢力範圍」(頁56-63)。

王柯也討論了當時新疆的最高領導人盛世才的反日態度，他認為是受到郭松齡與馮玉祥的影響。同時由於國府對盛世才的態度曖昧，袖手旁觀，使得盛世才選擇倒向蘇聯，這樣可以藉蘇聯之力壓制第一次東突獨立運動時的各方民族勢力，否則與蘇聯一直保持接觸的新

疆各方山頭，如和加·尼亞孜(Hoja Niyaz Haji)、堯樂博士(Yulbars Khan)、馬仲英等人，都有可能危及盛世才在新疆的權力基礎(頁64-74)。

王柯在第四章「政治權利〔力〕<sup>②</sup>的雙重結構與民族問題——盛世才政權時期的政治路線和民族政策」，更仔細地描述在蘇聯的庇蔭下盛世才與蘇聯的權力糾纏。蘇聯幫助新疆盛世才政權，重整新疆的軍隊、行政、經濟，模仿蘇聯處理民族問題的方式安撫新疆各民族勢力；同時盛世才卻不願大權旁落，與蘇聯共同治理新疆。換句話說，盛世才與蘇聯為當時新疆政治的兩股勢力，互相競合(頁86-93)。所以，盛世才為了排除異己，鞏固權勢，在1937與1940年分別發動大清洗，逮捕並整肅蘇共與中共的人員，而新疆當地民族菁英也包括在內，這都埋下第二次東突獨立運動中大規模民族衝突的伏



盛世才

線(頁102-12)。所以一旦盛世才與蘇聯反目，民族問題就被引爆。

雖然蘇聯對新疆不見得有領土野心，但是為求管控盛世才，遂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蘇聯派遣顧問、駐迪化總領事的現場監控、組織「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動員群眾、設計「省政府政治監察總管理局」作為秘密警察，以及設立負責情報搜集的「新疆邊防督辦公署邊務處」，都使得盛世才心生嫌隙(頁94-102)。

王柯在第五至第九章主要討論「伊寧起義」與東突國的興衰，較少著墨張治中主持下的「新疆省民主聯合政府」。但是他在描述伊犁政權菁英內部政治立場以及與蘇聯的關係上，卻與王大剛在論述的側重上有些許不同之處。

第五章「蘇聯支持的中國突厥系伊斯蘭民族居民的『聖戰』——第二次獨立運動爆發和伊寧起義」透過介紹當時民族解放組織的文件〈我們為甚麼要奮鬥〉，闡述東突獨立運動的國家論述。文件的主旨是將不同突厥系族裔集合到「東突厥斯坦」的國家概念下，呼籲推翻中國在新疆的漢族政權，建立親蘇的維吾爾政權(頁126-31)。世俗的維吾爾政客與知識份子也了解透過伊斯蘭宗教動員群眾支持的重要性，於是主動吸收並推舉宗教人士伊力汗·吐烈(Ali Khan Türe)為民族解放組織的主席(頁136-39)。最後在蘇聯的軍火武力支援下，於1944年成功發動「伊寧起義」。

作為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的群眾動

員目標與能力也不盡相同，在政治上其實常有分合與爭拗，並不見得一定能採取一致行動。如果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東突獨立運動是世俗政治人物主導，並爭取宗教人士透過伊斯蘭信仰進行政治動員，與中國「異教徒」政權進行對抗，那麼當前全球反恐戰爭中新疆發生的紛紛擾擾，反而呈現出世俗政治人物與宗教勢力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的現象。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礙於國際政治的普世規範以及與美國的友好關係，反而極力與極端的東突伊斯蘭組織(如「東伊運」或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劃清界線<sup>⑬</sup>。

### 三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權力結構與民族關係

王柯在書中第六章「權威與權力——戰時體制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政治結構」中比較詳細地分析「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權力結構與功能。他的看法也與王大剛類似，認為東突國臨時政府主要有兩股勢力：一是宗教人士以及傳統社會的地方鄉紳勢力，二是親蘇維吾爾知識份子以及蘇聯籍人士。但是王柯進一步分析，前者的功能在於鞏固政府權力的社會正當認受性，例如讓伊力汗·吐烈擔任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和加(Hakimbek Hoja)擔任副主席；而後者則與蘇聯合作，管控軍情單位，例如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irim Abbasof)掌管內務部，也就是警察與檢察機關(頁171-81)。

如果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東突獨立運動是世俗政治人物主導，並爭取宗教人士透過伊斯蘭信仰進行政治動員，與中國「異教徒」政權進行對抗，那麼當前全球反恐戰爭中新疆發生的紛紛擾擾，反而呈現出世俗政治人物與宗教勢力分道揚鑣、各行其是。

伊犁維吾爾菁英沒能透過成立東突國來黏合不同族裔，他們之間的嫌隙也繼續成為東突國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東突國實際上只是反映一種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興起，並不能夠完全吸納其他新疆當地族裔的政治認同。

這兩股勢力其實並不融洽，在政府部會中，也都設有蘇聯顧問與宗教顧問，下達命令都要經過他們一致同意。宗教人士需要蘇聯的武力援助，而蘇聯則需要宗教人士掩蓋干涉中國主權的事實，於是東突國形成一種兩元共存體制（頁192-93）。至於東突國民族軍系統的主要官員，像是總指揮、團、營籍幹部多由蘇聯籍人士擔任；換句話說，終極權力仍是由蘇聯掌控。

至於同被劃歸親蘇派的阿合買提江·哈斯木 (Ehmetjan Qasimi) 與阿巴索夫，他們之間的關係其實並不清楚。王大剛認為蘇聯比較信任阿合買提江，但是王柯對此並沒有討論，只是在第九章〈「民族獨立」還是「民族解放」——「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消亡〉比較詳細描述伊力汗·吐烈極力反對與國府和談，而阿合買提江與阿巴索夫則都願意妥協，接受蘇聯設定的談判議程（頁262-86）。

綜合王柯與王大剛兩書的討論，似乎可以大膽猜測阿合買提江比較願意接受蘇聯的指導，以迂迴方式，透過聯合政府，不用武力，繼續開展「民族革命」，將伊犁政權的勢力向南疆擴散。阿巴索夫則發展東突國境內組織勢力，鞏固根據地內部的動員力量。王柯提及1946年在東突國成立的「東突厥斯坦革命黨」曾經參考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頁277-78），王大剛也描述同年阿巴索夫曾經在南京面見董必武，企圖與中共建立關係<sup>④</sup>，將

「伊寧事變」導向「共產革命」。這或許是阿巴索夫先後私自設立「東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組織」、「東突厥斯坦革命黨」的背景原因（頁269-79），整建具有鼓吹與實踐共產主義性質的政黨。然而，這樣的推論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歐亞大陸上的泛突厥主義其實穿插着各種不同內涵的認同，在政治上充斥各種愛恨情仇的糾結矛盾。在族裔政治上，深究新疆「族際關係」，也就是在維吾爾、哈薩克、吉爾吉斯、蒙古、白俄歸化族、東甘/回族之間踟躕。就算在當時，伊犁維吾爾菁英也沒能透過成立東突國來黏合這些不同族裔，他們之間的嫌隙也繼續成為東突國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維吾爾族佔據第二次東突國政府大部分的重要職位，也可以作為一例說明為甚麼哈薩克族領袖烏斯滿·斯拉木 (Osman Batyr) 統領三區之一的阿勒泰，卻與伊犁政治菁英格格不入（頁303-307）。東突國實際上只是反映一種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興起，並不能夠完全吸納其他新疆當地族裔的政治認同。

至於應該是作為結論的第十章「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對第二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深入分析」中，王柯歸納出五點：第一，東突國實權操縱在蘇聯與親蘇派進步份子的手裏，這也導致在阿勒泰地區崇尚傳統的烏斯滿最後倒戈；第二，東突國未能融合現代化與傳統價值，一方面推動現代教育、法治、政教分離，另一方面仍要透過

宗教與傳統社會階層來控制社會，社會結構充滿矛盾；第三，東突國的建立與內部權分配基本反映出「大維吾爾民族主義」，哈薩克族的地位顯得格格不入，當然這可能與農工和遊牧的生活方式有關；第四，東突國的財政收入基本上是透過向蘇聯提供礦產與農產品，換回經濟援助與武器，但是愈到後期赤字情況則愈糟糕；第五，蘇聯介入當然是「伊寧起義」爆發的重要原因，但是也不能忽略泛突厥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動員能力（頁294-317）。

但是第十章的內容似乎並未完整地呼應全書的主要論點，反而另闢出一些新課題，令人感覺突兀。尤其是關於東突國的法治、教育、經濟與社會發展，前面並沒有專章討論，突然置入在結尾的第十章，好像全書又再牽引出新的理路。第二次東突獨立運動與新疆現代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需要放在國族建構的角度作討論；第二次東突國短短存活數年時間，似乎不足以論定伊斯蘭宗教人士與世俗派權力的競爭互動關係。

## 四 結語

總結王柯全書論述，主調在於說明十九世紀末新疆建省改制納入中原政體之際，中亞區域國際形勢丕變，不僅俄、英、日、美列強勢滲入，泛突厥主義也開始輸入新疆，並且配合伊斯蘭宗教新思潮發展，嘗試塑造並黏合出一個新

的、不相容於中國的民族認同。蘇聯於是利用新疆內部族裔認同的歧異與矛盾，在與盛世才政權反目後，發動「伊寧起義」，謀求自己最大的利益。

王柯的這本專著試圖透過「伊寧起義」與東突獨立運動相關議題，點出現代中國由一種帝國形態向民族國家轉變的深層困境，那就是源於國家結構轉型所導致的民族與國族認同的錯亂，致使給予其他國際強權可乘之機。王柯在書中的第五章描繪「伊寧起義」、第七章討論東突國勢力擴張、第八章講解和平談判的過程，論點都在強調蘇聯主導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收藏在中、俄兩國的相關歷史檔案並未完全開放查閱，資料並非容易取得。王柯的著作引用頗多珍貴的檔案資料，難能可貴。可惜的是，並非所有研究者都可以如作者一樣登門入室，直接接觸「伊寧事變」與東突國的相關檔案，這也使得我們無從查究此書運用與闡述史料的精確度，遑論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王柯點出現代中國由一種帝國形態向民族國家轉變的深層困境，那就是源於國家結構轉型所導致的民族與國族認同的錯亂，致使給予其他國際強權可乘之機。

### 註釋

- ① 參見王柯的日文版博士論文《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國研究：中國のイスラムと民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
- ② 該章的初稿原為日文〈ウンマと中華の間：清朝治下（ちか）の新疆ウイグル社會〉，載樺山紘一、

川北稔らを編集委員とし：《イスラーム世界とアフリカ——18世紀末-20世紀初》（東京：岩波書店，1998），頁97-118。

③ 王柯採用的「伊寧起義」與楊邊琳(Linda Benson)使用的「伊犁抗暴」(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M. E. Sharpe, 1990]) 都有着類似的語意暗示，不無可能是以此呼應中共政權原有「三區革命」的論述口徑，或指謂抵抗盛世才與國府政權不當統治的意思。當然也有學者，像是王大剛，採用「伊寧事變」作為該事件的稱謂(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在語意上也意味着不肯定這是一場「起義」或「革命」。至於以「東突獨立運動」統稱時序上前後相關的事件，當然就是意指那些都是泛指維吾爾民族主義勃興所造成的反抗行動。

④ 例如山內昌之的評語，參見 [www.suntory.co.jp/sfnd/prize\\_ssah/detail/1996sr1.html](http://www.suntory.co.jp/sfnd/prize_ssah/detail/1996sr1.html)；小松久男：〈王柯著「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國研究：中國のイスラームと民族問題」〉，《アジア經濟》，第37卷第12號，1996年12月，頁78。

⑤ 例如新免康：〈書評：王柯「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國研究」〉，《歷史學研究》，第695期，1997年3月，頁54-56。

⑥ 王柯其他相關現代中國國家格局的重要著作為：《走向民族國家：中國近代民族國家思想誕生的國際因素》（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天下」を目指して：中國多民族國家の歩み》（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2007）；《二〇世紀中國の國家建設と「民族」》（東京：東京大學

出版會，2006）；《多民族國家中國》（東京：岩波書店，2005）；《民族與國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⑦ 這種說法來自日本學界非公開場合的討論，較為露骨的批評則可參見「極東ブログ」的書評（2005年10月6日），[http://finalvent.cocolog-nifty.com/foreastblog/2005/10/\\_2bf4.html](http://finalvent.cocolog-nifty.com/foreastblog/2005/10/_2bf4.html)。

⑧ 清代新疆的「伯克」官職約有三十餘種，官階品級為三品到七品，主要設置於南疆人口密集的喀什、葉爾羌、和闐。

⑨ 日本史學界對新疆做出這樣類似口徑的研究傳統可參見佐口透：《19世紀中央アジア社會の變容》（東京：岩波書店，1971）；羽田明：《中央アジア史研究》（京都：臨川書店，1982）。

⑩ 美國新清史研究已經成為一種顯學，參見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歐立德(Mark C. Elliott)、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羅友枝(Evelyn Rawski)等人的著作，至於清代新疆史也可參見米華健(James Millward)的研究。

⑪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⑫ 書中標題誤植為「權利」，參照章節內容與副標題，應該為「權力」。

⑬ 有關新疆伊斯蘭對抗運動發展現況，參見侍建宇：〈北京天安門撞車襲擊事件與新疆本土化伊斯蘭主義發展〉（2014年2月），台北論壇基金會，[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_pdf/125.pdf](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_pdf/125.pdf)。

⑭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354-56.